

# 自我解放

终结压迫、争取自由的战略规划指南

吉恩·夏普(Gene Sharp) 著

杰米拉·拉奎伯(Jamila Raqib) 协助

爱因斯坦研究所

## 目录 有哪条路通向解放？

那么，还有其他争取解放的选项吗？

超越过去的经验

务实的和战略性的

获取新知识

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地区的经验

三种类型的知识

国外帮助？

寻求深度知识

基本战略考虑：对手的权力、力量来源

基本战略性考量：依赖关系的平衡

基本战略考量：公民社会的现状如何？

基本战略考量：运动目标与行动是否会加剧压迫体系的弱点？

基本战略考量：冲突中主动权的重要性

挑选战略计划起草人

基本战略决策

形成一个总体战略

迈向这个可能的步骤

解放，但不完美

附录一

阅读资料

附录二

非暴力抗争重要术语表

## 自己解放自己

### 有哪条路通向解放？

许多人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即政府被视为专制的，或者说得柔和点，是威权政体。通常，大多数生活在这种国家的人，都希望那个压迫他们的政治体系能够被更民主、自由的政治体系所取代。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

而且，专制统治并非压迫的唯一主要类型。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压迫制度也是存在的。当人们想结束压迫，实现更大程度的自由和正义时，有没有一条现实、有效、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坚持的道路呢？

许多人已寻找过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为实现解放而努力奋斗过。还有许多人设法帮助支持过受压迫的人结束他们受奴役的状态。然而，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宣称已经给出了足够的答案。这些问题的挑战依然存在。

被宰制的民众在与专制或其他压迫的冲突中，有必要决定他们是否只是希望谴责对他们的压迫、抗议那种制度，还是真地希望结束压迫，用一个更自由、民主、公正的制度来取代它？

许多善良的人以为，只要他们对压迫的谴责足够强烈、抗议的时间足够长，他们想要的变化就会以某种方式发生，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在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是会有风险的。并非所有给出的答案都有同样的价值。一些自诩为“革命家”的人，无论口头上说得多漂亮，却不信任受压迫的民众。那些“革命家”相信，无论应该“被解放”的民众的意愿如何，只有他们这种“监护人”集团通过某种方式控制了国家机器、并利用行政和镇压体系重塑这个社会，专制统治才会被彻底终结。

我们需要新思维，才能要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本书作者在先前的《从专制到民主：解放的概念性架构》一书中，已经对如何终结专制的问题进行了一般性阐述。

你眼前这本战略规划指南，其目标要更为集中。它旨在帮助那些想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并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人，制定一个总体行动战略或着说超级计划。它不仅对于那些要与专制做斗争的人有指导作用，也应该能帮助到遭受其他形式压迫的人们。

这本小册子无法充分深入地呈现非暴力解放战略规划所需的所有知识和领悟。因此，探讨相关重要议题的参考书目会穿插出现在本文件中。依照它所推荐的次序来仔细研究那些精选文献，是十分重要的。你能在其中找到许多对制定解放战略有益的领悟、知识和洞见。

**关于战略术语的定义、解释，请阅读：《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 492—495 页；《开展非暴力抗争》，第 444—445 页和 454—461 页；以及《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 504—510 页。共 21 页。**

**注：有关这些和此后所有引文的出版信息，请详阅本小册子最后所附“阅读资料”部分。凡没有列出作者的出版物均为夏普所著。**

我希望，通过使用该战略规划指南，未来摆脱压迫的非暴力抗争会更为有效、同时也伤亡更少。

目前，生活在专制或其他严重压迫下的人们，没有多少足够有效的选择来实现自我解放：

- 普选，这一可以为建设自由民主社会带来所需的重大变化的机制，通常不存在、被操控，或者其结果会被伪造或无视。
- 暴力反叛，包括游击战和恐怖行动，通常会招致毁灭性的镇压，出现大规模伤亡，最终走向失败；即便“成功”，结果可能是更强有力的专制。
- 政变常常会失败，或者仅仅在旧的职位上任命新的个人或集团。

- 渐进演变或许会耗费数十年，也可能会不止一次地被中断或逆转。

在思考如何从压迫中获得解放时，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有什么容易的方式。恰恰相反，为消除压迫而计划和实施有效的行动，历来总是极其困难的。同时，毫无伤亡地实现解放几乎不可能。应当铭记，采取任何手段消除压迫制度，都可能遭到严酷镇压。

在面对极端压迫和可能的严酷镇压的现实时，屡屡有个人、抵抗组织，以及，另一方面，也就是大多数政府，只对用军事行动解决冲突保有信心。事情就是这样，尽管有证据表明，使用暴力手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压迫政权通常装备良好，可以发动实施极端暴力的镇压。

有时候，渴望更多自由的人们会对自我解放失去信心。有些人甚至寄希望于强大的外国军事干预。选择这种路径有严重的缺陷：

- 外国政府可能会以一国的专制问题为借口进行军事干预，而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另外的、没那么高尚的意图。
- 在发生干预的情况下即便外国政府干预的最初动机是利他的，随着冲突发展，进行干预的政府很可能发现，他们有机会实现对更自利的目标；它们包括控制经济资源或建立军事基地。
- 一个政府如果拥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去废除另一个国家强大的压迫制度，那之后它也通常会有足够力量强加自己的目标，即使那些目标是“被解放”的民众无法认同的，这种情况还是可能会发生。

相反的，现实的、依靠靠自己结束专制或其他压迫的能力，不只对应对本国当前的压迫制度有用；这种自我解放的能力，还可以使一种虚假辩称失去可信度，即提供外来干预的政府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促进更多的自由和正义，而真实的目标却很不相同。

那么，还有其他争取解放的选项吗？

过去曾发生过重要的、自发性或突发性的反专制或其他压迫的非暴力抗争。它们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结果——有些失败了，有些成功了，有些二者兼有。

那些公开抗议、不合作行动和扰乱性干预，不时会给压迫制度带来严峻挑战、并挫败专制统治者。有时候，它们甚至会导致压迫制度和残暴的专制政权崩溃<sup>1</sup>。

那些非暴力抗争中，有少数几起出现了富有领导魅力的个人，如印度的莫罕达斯·K·甘地。然而，这些案例并不典型。使用这种抗争技术的、更广泛的历史，可以证伪有关非暴力抗争流传甚广的大多数成见和误解，只是那种更广泛的历史一直受到忽略。

最近几十年发生的、被称为“颜色革命”的几起革命和反叛，是人们所熟知的。这些案例带来了希望，因为人民大众参与到了这些以非暴力为主的抗争中、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非暴力抗争的成功有赖于多种多样的因素，包括当时的情势、对以前案例的了解、是否存在一个明智的战略、计划的实施程度和所运用的抗争方法<sup>2</sup>。

## 超越过去的经验

有关这种非暴力抗争技术是如何操作、起作用的，诚然还有许多有待学习。不过，历史上的应用和我们现在的知识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即不仅可以预期这种技术在未来会更广泛地使用于与专制、压迫的种种对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凭借更多的知识、明智的战略计算、扩展的经验计划和提升了的行动技巧，未来反抗压迫的非暴力抗争，其有效

---

<sup>1</sup> 参阅吉恩·夏普著，《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波士顿：波特·萨金特出版社，1973年）。吉恩·夏普著，《发动非暴力抗争：20世纪的实践与21世纪的潜力》（*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20<sup>th</sup> Century Practice and 21<sup>st</sup> Century Potential*）（波士顿：扩展新视野书局，波特·萨金特出版社，2005年；罗纳德·M·麦卡锡（Ronald M. McCarthy）和吉恩·夏普著，布拉德·班尼特（Brad Bennett）协助，《非暴力行动：研究指南》（*Nonviolent Action: A Research Guide*）（纽约和伦敦：戈兰德出版社，1997年）。

<sup>2</sup> 影响非暴力行动某次特定应用是否能成功的要素清单，请参阅夏普的《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第815—817页。

性也几乎可以肯定会大大增加。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几乎任何行动，如果是出自仔细思考、谋划的努力，其效果都会大大提升。

与前面提到的其他可能的行动方式相比，对于争取实现一个更民主、自由、正义的制度，非暴力抗争看起来是一个真正值得严肃考虑的选项。那些探索这一选项潜力以争取实现更大的自由和正义的个人和团体，值得向他们道贺。不过，他们的任务是艰巨的。

重大变化不是仅仅靠声明长期目标和抗议现状就能够实现的。负责、明智和有效的战略行动，是不可缺少的。在面对深受其荼毒的压迫时，相对于暴力反抗或被动屈从，战略性非暴力抗争是能够成为可行的选项的。

这本小册子及指定读物，目的在于帮助那些在压迫中想要探究战略性非暴力抗争的实质与潜力、增益这方面的知识和领悟的个人与团体。这份文件的论点是，战略性规划可以在主要方面帮助到非暴力抗争的运用。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对冲突对抗启动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有深入考量，这种考量要求的是有事先的思考和事先对冲突结束后的政治秩序有某些规划<sup>3</sup>。

## 实用性和战略性的

本文件所要阐释的切入方式，是实用性和战略性的。它立足于现实，而不是心中的信念，尽管二者可以彼此兼容<sup>4</sup>。

前面说过，本指南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希望终结压迫、代之以自由公正制度的群体、组织规划如何有效地开展非暴力抗争，规划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

---

<sup>3</sup> 参阅后文所述军事政变的风险。

<sup>4</sup> 有关许多有原则非暴力类型的说明，参阅：吉恩·夏普著，《作为政治战略家的甘地及其伦理政治短文》（*Gandhi as Political Strategist with Essays on Ethics and Politics*），第 10 章，“有原则的非暴力抗争类型”，第 201—234 页。有关有原则的实用方法分析，参阅第 13 章，“非暴力：是道德原则还是政治技巧？甘地思想与经验中的线索”，第 273—309 页。也可参阅夏普的演讲《在激烈冲突中，相信有原则的非暴力的人们有何选择？》，2006 年 9 月 22 日发表于圣母大学乔安·克罗克（Joan B. Kroc）国际和平研究所，可由网站 [www.aeinstein.org](http://www.aeinstein.org) 下载。

明智的计划也能帮助抗争者减少伤亡和损失。有些抗争方法可能特别具有挑衅性，使示威者成为很容易受到军队镇压的目标。比照而言，其他一些方法可能会在不增加伤亡的情况下，造成更大的冲击。例如，一种方案可能是让示威者到街上冲着携带机关枪的军队游行；另一种方案则是敦促抵抗者撤出、净空街头、在家里待一段时间。

## 获取新知识

若干年来，我们当中一些关注应用非暴力抗争以实现解放的同仁，曾通过讲座、课程和研讨会，集中阐释战略规划的重要性。那些活动由某个个人或者团队，在欧洲或亚洲的不同国家举办了十余年。

其中一些讲解的内容是介绍性、入门级的，而另一些则是进阶的。有时候，会是为期两周的一门课程，上午、下午都上课。有时候，是为期两周、包含讲座的研习班，重点在参加培训的那批人以后如何为自己的抗争做总体战略规划。

在当时看来，那些讲座、课程和研讨会已经到位了、足够了。那么，今天如何评估它们的有效性呢？

显然，口头讲解对于向新人介绍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以及激发他们关注过去很少或根本没有关注过的问题，是有用也是有效的。另外，在某个有限的战役性抗争中，在那种性质的抗争中的一次游行发生之前，以“培训”课程方式进行的口头讲解，对于预备好参与者、使他们可以在有计划的示威中有效行动，也会非常有帮助。

这类口头讲解的积极效果很重要，但它们不足以帮助人们制定战略计划。似乎清楚的是，战略规划和高阶应用所需的知识和领悟，看来并不能通过讲解和讲习班充分传达。这一结论也适用于讨论会，即便参加讨论的人已经有良好的知识、资讯基础。

概而言之，单靠口头讲解不足以达到这两点——：

- 传达进阶知识；
- 帮助听讲人达到这样的程度，即能展开进行战略性分析。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发现参与过讲座、课程和研讨会的那些群体、组织自己依然不能为对抗进行战略规划。他们往往甚至都没有能力为较小的、有限的战役性对抗拟定战略，从而实现并不那么高的目标。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依然很难找到证据来证明，我们所讲解的基本知识和理念已经被参与者充分吸收，从而在他们后来的决策和行动中发挥了影响力，就更不要说使他們有能力进行战略规划了。

仅只通过听讲，许多人只能达到有限的理解。非暴力抗争所需的知识与领悟，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似乎都太广博、太复杂，不能轻易从单独的口头讲解中吸收、获得。

有一种被称为“培训培训师”<sup>5</sup>的做法，也曾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表面上看，它非常有用，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大批量地帮助人成为未来游行抗议中合格的非暴力行动者。这种模式基础上所进行的讲授、指导，对于培养培训师这一特定目的本身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然而，要实现进阶的非暴力行动目标，这个方法的作用就很令人怀疑了。

这种方法，根据其定义，即“培训培训师”，几乎就可以知道它无法培训任何人为任何层次的行动做战略规划，因为它冲淡、简化了进行战略规划所需的大量知识。此外，它还有一个假定，就是必须的知识和理解能够两次以口头方式，成功地从一批人传递给另一批人，然后可以应用于战略规划。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很成问题的。

所以，我们确实应该探索、另辟蹊径，以使受压迫的群体可以学习如何为争取自我解放进行战略规划。对他们必要的那些知识和领悟，如果以其他某些方式传授，或许有可能被更好地吸收。

## 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地区的经验

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两个当代的重大案例，它们表明接触、吸收非暴力抗争的知识、信息，能取得不同寻常的成效。我指的是1991年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独立运

---

<sup>5</sup>“培训培训师”的做法，是为了突破面对面培训人数有限的局限而产生的，指的是非暴力研究机构先培训讲员，讲员回去后可以培训更多的人——译者注。

动领导人提供的咨询、商讨，以及 2000 年为塞尔维亚希望结束米洛舍维奇专制政权的那些人开办的讲习课。这两个案例与其他案例非常不同，因而值得给予专门关注。

立陶宛等三个波罗的海小国历史上曾是独立国家，相继被苏联吞并、被纳粹德国占领，然后又再次被并入苏联。这些事件带来了灾难性的变化、触目的破坏、大规模的屠杀、大量的驱逐和主体人口数量的变换，以及强加给他们的残酷统治。为反对这些行径，人们曾进行过多种多样的抵制。在立陶宛（1944 年—1952 年）、拉脱维亚（1941 年和 1944 年—1945 年）和爱沙尼亚（1944 年—1949 年左右），人们曾进行过重大的游击战抗争反抗苏联统治。

游击战抗争走到尽头后，以及某种程度上在游击战期间，民众进行了非常重要的非暴力游行和抗争。那些行动的进行在后期得到了支持独立的政党的鼓励或协助，最后还得到了选举出来的、同情独立的政府同情的鼓励或协助。

但这些先前的运动完全是本土的，就目前所知，几乎没有或者极少受到外部有关非暴力抗争信息源的影响。

1991 年，也就是在重大的非暴力抗议和抵制已经发生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的代表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就非暴力抗争和基于平民的防卫之性质（civilian-based defense）<sup>6</sup>提供咨询。第一次咨询由吉恩·夏普、布鲁斯·詹金斯和彼得·阿克曼主持，第二次由吉恩·夏普和布鲁斯·詹金斯主持<sup>7</sup>。他们会见了支持独立的党派成员、领导人以及支持独立的当选政府官员。顾问们还举办了讲座和对谈，并与高级政府官员和议员进行了非正式会谈。所有的探讨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非暴力抗争的性质和潜力。顾问们没有对任何人在他们的抗争中具体做什么提出建议。

时任立陶宛国防部总督导的奥德流斯·布特克维丘斯，此前从立陶宛学院的格拉齐娜·米尼欧台特博士那里，得到了新书《基于平民的防卫》<sup>8</sup>早期的散装校对本。米尼欧台特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从夏普和詹金斯那里得到的散装本。布特克凯维丘斯

---

<sup>6</sup> 为抵抗外国侵占与军事政变而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非暴力不合作和反抗。

<sup>7</sup> 应立陶宛外交部邀请，他们在 1991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做了咨询。第二次行程是 1991 年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7 日，到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首都。他们就有组织的公民抵抗对组织政变企图和外国入侵的潜力进行了多次讨论。参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1990—1992 双年刊，第 5 至第 9 页（剑桥，马萨诸塞，1993 年）。第一次行程结束后，应奥德流斯·布特克凯维丘斯（Audrius Butkevicius）的要求，布鲁斯·詹金斯写了一份关于平民防御的研究指南，供立陶宛国防部的一个研究小组使用。

<sup>8</sup> 吉恩·夏普著，布鲁斯·詹金斯协助（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 年）。

影印了 50 份散装本送到苏联各地，包括邻国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读完该书后，帕特凯维修斯感叹：“啊，这种事竟然有一个体系！”<sup>9</sup>

于是，刚开始时自发的、象征性的非暴力抗议，例如 200 多万人构成的人链将波罗的海三国首都连接起来，演变成了后来更系统、更精心谋划的、正式的诸种非暴力不合作抗争形式<sup>10</sup>。

创建偏向独立的新机构、组织，以及使现有机构组织转向支持独立，是这些运动的主要特点。当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宣布波罗的海诸国的独立宣言于法无据、是无效的。

奥德流斯·布特克凯维丘斯后来成为国防部长，他说《基于平民的防卫》一书所讲内容是立陶宛抗争战略的基础。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塔拉夫·云济斯和爱沙尼亚的国务部长赖沃·费尔也有类似的赞誉。

1991 年 1 月 13 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鲍里斯·叶利钦与波罗的海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市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承诺互相帮助和援助，抵制任何对它们自身事务的军事性干预。后来，经过谈判，苏联军队完全撤走了。

---

<sup>9</sup> 布特克凯维丘斯有一本为政府使用而翻译的《基于平民的防卫》的立陶宛速译本。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塔拉夫·云济斯 (Talavs Jundzis) 也有一本供政府使用的速译本。爱沙尼亚的国务部长赖沃·费尔 (Raivo Vare) 则使用英文原著。

这本书后来以三种语言出版，爱沙尼亚语由塔林市 (Tallinn) 新闻局 (Informare) 出版，拉脱维亚语由雷佳市 (Riga) 云达出版社 (Junda Publishers) 出版，立陶宛语由维尔尼尔斯市 (Vilnius) 的名提斯 (Mintis) 出版社出版。三者都得到了各自主管国防事务的部长的支持。

在第二次行程中，夏普与詹金斯不仅会见了立陶宛的国防部官员，而且还在拉脱维亚会见了国防部长塔拉夫·云济斯及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的成员。在爱沙尼亚，夏普与詹金斯会见了国务部长赖沃·费尔及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国防部及政府官员。费尔部长向爱沙尼亚各地政治中心发出非暴力抵抗的指令，但故意没有在他的办公室留下副本。

1991 年 12 月，布特克凯维丘斯认为《基于平民的防卫》一书为策划非暴力抵抗苏联占领（第一次于 1991 年 1 月、第二次于 1991 年 8 月）奠定了基础。

<sup>10</sup> 参阅：欧尔格兹·艾格利提斯 (Olgerts Eglitis) 著，《解放拉脱维亚的非暴力行动》 (*Nonviolent Action in the Liberation of Latvia*) (剑桥，麻州：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1993 年)；葛拉吉娜·米尼欧台特 (Grazina Miniotaite) 著，《立陶宛的非暴力抵抗》 (*Nonviolent Resistance in Lithuania*) (剑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2002 年)。

对拉脱维亚非暴力解放抗争更详细而完整的研究，参阅：瓦蒂斯·布罗兹玛 (Valdis Bluzma)、塔拉夫·云济斯 (Talavs Jundzis)、詹尼斯·力克史庭斯 (Janis Riekstins)、吉恩·夏普及翰力斯·史特罗斯 (Heinrihs Strods) 著，《非暴力抵抗：拉脱维亚独立重生的抗争 (1945—1991)》 [*Non-violent Resistance: the Struggle for Renewal of Latvian Independence (1945-1991)*] (雷佳市：拉脱维亚科学院，2009 年)。

立陶宛在电视塔大游行中死亡 14 人，独立后在边境海关军营死亡 6 人。拉脱维亚死亡 14 人。爱沙尼亚无人死亡。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全部成功地脱离了曾完整无损的苏联而独立，尽管它们处在易受攻击的地带、已被苏军占领，而且苏联拥有压倒性的军力。

在塞尔维亚，90 年代后期，塞族人常常在严寒中举行自发性、象征性的非暴力抗议，反抗米洛舍维奇总统的专制统治。

关于非暴力抗争的知识、资讯，是罗伯特·L·赫尔维（Robert L. Helvey）2000 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次讲习会上提供的。与会者是一群年轻的塞族，他们后来组成了政治抵抗组织“奥特波”（Otpor）<sup>11</sup>的。赫尔维将他自己的系统讲解与主要推荐读物结合起来，推荐读物包括吉恩·夏普的《从专制到民主》和《非暴力行动的政治》。讲习会似乎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赫尔维将这些书留给与会者，让他们带回塞尔维亚。一个叫“公民倡议”（Civic Initiatives）的组织出版了塞尔维亚语的《从专制到民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sup>12</sup>

斯尔贾·波波维奇是在布达佩斯与赫尔维会面的塞尔维亚抵抗团体的主要战略计划人，他先前就曾研究过不同组织、机构的实际运作。他当时正在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以采取行动结束米洛索维奇的专制统治。

斯尔贾·波波维奇研读完《非暴力行动的政治》之后，这样写道：“……夏普的著作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有效的蓝图，在引领民众加入为自我解放而进行多元、非暴力的抗争时，可以用来对抗残暴的专制体制”<sup>13</sup>。

斯尔贾·波波维奇和他的同事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权力必要的六个来源<sup>14</sup>，作为瓦解摧毁压迫性政权的关键点：缩小或切断政治权力的这些来源，政权就会遭到削弱或瓦解、崩溃。

上述波罗的海所有三个国家以及塞尔维亚，它们的经历有五个共同之处：

---

<sup>11</sup> 奥特波是 Otpor 的音译，在塞尔维亚语中的意思是“抵抗”——译者注。

<sup>12</sup> 英文文本是由加州的马雷克·奇拉基维兹（Marek Zelaskiewicz）给他们的。

<sup>13</sup> “CANVAS 完全索引：塞尔维亚非暴力冲突舞台：吉恩·夏普非暴力行动理论在米罗塞维奇统治时期的分析性概述”（CANVAS TOTAL INDEX: Serbian Arena for Nonviolent Conflict: An Analytical Over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Gene Sharp's Theory of Nonviolent Action in Milosovic's Serbia），影印本，第 8 页，贝尔格莱德市，2001 年。CANVAS 是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的首字母缩写，位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

<sup>14</sup> 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一书中有详细阐述。

- (1) 所有这四个国家都曾在极其残暴的政权之下饱受压迫；
- (2) 每个国家历史上都曾经历过重大、但没有成功的暴力抗争。
- (3) 波罗的海国家在 1990 年之前、塞尔维亚在 2000 年之前，都已经发生过重大的、本土自发组织的民众非暴力抗议与抵抗。
- (4) 外部专家提供了面对面讲解、讨论，那些专家对反抗专制统治、外国占领和军事政变的非暴力抗争，有多年研究与分析的背景。
- (5) 专家口头讲解与相关重要的印刷读物相结合，即关于政治权力和反抗专制、侵略的非暴力抗争的读物。在波罗的海国家案例中，重要的政府与非政府政治领导人都有渠道获得那些读物。在塞尔维亚的案例中，则只有非政府政治领导人可以获得。

## 以前的规划经验

思考并计划如何才能让一个特定的非暴力抗议或抗争更为有效，不仅是值得追求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做这样的规划，并不完全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新鲜事。过去有多种多样的规划。

在以前的小规模运动中，例如在美国为反种族隔离而采取的巴士抵制运动和午餐桌静坐中，反抗者都做过计划。同样的，几十年来，为了和平、社会正义、女性选举权、公民权、人权及环境保护而进行的长达数天或数周的抗议游行，也都做了战术上的准备。

在若干个国家发生的、为了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多种多样的大罢工，也做过计划和准备。早在 1765 年至 1775 年，美国殖民地反抗英国管制的非暴力抗争中，不仅有战术性的，而且甚至有长期的、战略性规划<sup>15</sup>。

迄今，还出现过天赋过人的直觉型战略家，虽然非常罕见，例如，印度的莫罕达斯·K·甘地，他给出了在各个战术阶段应该执行的战略要点。

---

<sup>15</sup> 参阅：沃尔特·康瑟二世 (Walter H. Conser)、罗纳德·麦卡锡 (Ronald M. McCarthy)、大卫·托斯卡诺 (David J. Toscano)、吉恩·夏普编，《抵抗、政治与美国独立抗争，1763—1775 年》(Resistance,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765-1775) (波德市，科罗拉多州：林恩·林纳出版社，1986 年)。特别注意“附录 F，大陆协定，1774 年 10 月”。

在波兰，1980年代，参加独立工会“团结工会”及其他相关组织抗争的民众，以自身的历史经验为镜鉴、克服重重困难而赢得了自我解放。在塞尔维亚，2000年，为了开展推翻米洛舍维奇专制统治的抗争，也进行了事先的种种盘算、活动、准备和战略规划。

然而，在许多非暴力抗争引发的对抗中，情况并非如此。屡屡完全不存在战略考量，或者，有时虽然有计划、但计划不充分。不过，依然有一些这样的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但也应当指出，有很多这样的抗争收效甚微。还有灾难性的失败和可怕的伤亡，例如，发生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就是这种情况。未来需要减少这样的失败和伤亡，同时要取得更大的成功。

更加全面、优质的战略计划，可以让未来反抗极端压迫的非暴力抗争更为有效，而且也有助于减少伤亡。不过，依靠外部顾问制定计划可能既危险也不明智。最好是抗争者能够随时获取关于战略规划的知识，这样的话，面对专制和其他压迫的人们，就能依靠自己去规划如何解除专制、压迫。

## 一种自主规划的新模式

前面已讨论过，对于自主规划这个问题，听口头讲解所能获得的领悟、了解，看来要比仔细研习印刷在纸上的讲解和分析更加有限。印刷资料可以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阅读，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慢慢研究，也可以重复阅读和回头复习。

本文件要探讨发展一个新模式，以期帮助这样的个人和群体，即他们想研究了解非暴力抗争对于摆脱压迫、获得解放的可能潜力。这个模式也可能会帮助人们拓展他们的知识、理解和思考，从而能够学会在与极端对手对抗时，可以更有效地采取行动。为此目的，需要下功夫研读这里挑选出来的非暴力抗争书籍和资料，以及分析非暴力抗争对于那些在预期会有残酷镇压的国家所产生的尖锐政治对抗中，所能发挥的潜在作用。

如果你判断这个文件的分析有潜力能帮助人，那么，我们希望、鼓励你广泛传播并研读这里推荐的关于非暴力行动的出版物。相关知识的广泛传播和理解，也可以抵制任何可能的精英主义倾向。深度的知识可以遍布在许多人中间，而不是掌控在少数人手中。规

划未来抗争以实现与捍卫解放的技能，是可以广泛地传播的<sup>16</sup>。这种广泛传播会带来重大影响。

这条通向知识的新途径，如果得到精心细致的遵循，应该最终能够达到使个人和群体、组织，有能力依靠自己为重大的对抗准备总体战略，也能为局部的、目标有限的战役性行动准备单项战略。

如果准备了一个充分、明智的总战略，那么，它接下来就可以让抗争参与者以这样的方式行动起来，即累积成果、向抗争对抗所要达成的目标趋近。这一点是可以在他们对压迫者的政策、行动和镇压的时候同步完成的。

这样的成果不会有别人做好了放在银盘里端到你面前。只有当初次接触这种提升能力的方式的人将进一步的知识吸收消化为自己心中的东西时，这里所推荐的研究和规划才会产生积极效果。然后，经过合理的分析、精心的计划、有纪律和勇敢的行动，才有可能摆脱压迫制度，迈向一个以责任与自由为基础的、得到了改进的社会。

### 三种类型的知识

通过研究、观察与分析，我们知道，为了让人们获得能力制定一个可以成功地实现解放的抗争总战略，有三种类型的知识是必须的：

- (1) 关于对抗情境、对手、社会及其需求的知识。
- (2) 关于非暴力行动这种技术的性质与操作的深度知识。
- (3) 进行战略分析、思考和规划所需要的知识。

任何群体、组织，如果不具备这三种知识，就发动反抗专制或其他压迫制度的抗争，甚至试图为这种抗争准备总战略，都是愚蠢的，而且可能是灾难性的。

有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曾提出将分别具有这些类型专门知识的三个群体聚集到一起，以共享彼此所具有的知识。他们以为将三组人聚集到一个房间，就能产生一个可行的

---

<sup>16</sup> “精英主义倾向”在这里指的相关知识、领悟只局限于一小部分领先的人物中间——译者注。

总体战略。不幸的是，将三组人聚集到一起，每组有所需要的三类知识中的一类，并不能产生需要的结果。

这是因为，每一组特定的专门知识那时依然分散于每组人的头脑中。能够产生明智的总战略的那种分析能力，必须要这三种知识和思维融为一体。所有这三种知识，需要为那些准备战略草案的同一批人的头所具备，而不是仅分别存在于被召集到一起的三组人的头脑中。

所以，为了制定一个可行的、能实现能力提升和民主化的总计划，有必要探讨这三种类型的知识和技能如何才能融为一体。这种融为一体的知识，对于计划局部的、旨在实现较小目标的战役性行动，也是需要的。

### (1) 关于对抗情境、对手与社会的知识

生活在专制统治或其他压迫境况下的人们，很可能对他们所处的制度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他们有一些权力潜能。所谓“权力潜能”，是指那些如果被调动或运用起来，就可以使群体在对抗中行使重大权力、力量的素质、资源和能力。

以下这些问题或许有助于澄清这种知识是什么：

- 对抗所围绕、争执的问题或者说议题是什么？
- 这些问题、议题对双方的重要性如何？
- 这些问题、议题，或者对它们坚持的强度，是否已随时间而变化？
- 冲突双方向对方做出让步的容易或困难程度如何？
- 可能的让步对反压迫的抵抗者是有利还是有害？
- 抵抗的群体者能通过什么途径来动员其他人或群体参与到有关这些问题的抗争？
- 如何利用真正的议题来推动动员人们抵抗，减少对方所能获得的支持，并降低对方阵营和第三方势力内部人员的忠诚度？



流亡海外的人或许缺乏这方面的某些知识，但他们可能有其他优势。他们可能拥有大多数生活在国内的人所缺乏的信息和洞见。

在评估一国内部当下的局势时，对压迫体制和潜在的民主运动进行绝对和相对优势的对比，可能是很有帮助的。对手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抵抗者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这可以通过战略评估来完成。

**以下读物对战略评估进行了解释：《开展非暴力抗争》，第 525—541 页；罗伯特·赫尔维，战略性非暴力对抗》，第 47—65 页，和第 165—166 页。页数：38。至此总页数：59。**

然而，在做战略评估时，有必要注意，战略规划小组的成员不要沉迷于战略评估的细节，而忽视影响全局的主要因素。

重点是了解双方的优势和劣势，他们的权力、力量来源，以及在公开冲突中双方运用各自力量时可能产生的影响。还有，就是如何对双方的优势与劣势进行比较评估，以及双方目前的优劣态势会怎样被改变？

显然，最好能提前了解对手在企图制止不合作与反抗时，所能采取的暴力镇压和其他控制手段。这种信息，在为即将来临的对抗做计划时，必须纳入考量之中。

有时候，一个压迫性政权面对强大的反抗，可能会采取极端的镇压和残暴的措施。还必须考虑对手可能采取哪些心理、社会、经济和政治反制措施。抵抗民众不顾对手镇压和其他反击措施而在争取解放的抗争中坚持下去的能力与意愿，也需要评估。

## **(2) 关于非暴力行动技术的性质与操作的深度知识**

人们对非暴力行动技术的了解通常是贫乏的、理解是不充分的。很多人对它抱着谬误的先入之见。他们可能自认为很了解它了，但实际情况常常相差甚远。

就某些方面而言，非暴力抗争是非常简单的。但在另外一些方面，非暴力抗争的技术又是极其复杂的。要想制定出明智而有效的战略性计划，就需要对这一技术现象有高于基础程度的理解。如果不先对这一技术有极其透彻的理解，没有人能制定一个明智的、高度依赖非暴力行动的总体战略，也不能为单个的、局部的战役性行动制定战略。

对非暴力抗争技术现有知识和领悟的普遍不足，意味着那些只是意识到非暴力抗争可能有用的个人与群体，在没有事先认真研究并做好明智准备的情况下，不应贸然行动。

他们不应试图立即参与为整个抗争制定一个总战略，也不应为局部、有限的战役性行动制定单项战略。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缺陷会有助于防止简单化和危险的自以为是，它们会带来问题甚至导致灾难。

缺乏可靠的非暴力抗争技术知识，这长期以来一直是很普遍的现象。只是到了最近数十年，这种状况才在英语世界开始得到纠正。

尽管远非完美，那些参与制定战略计划所需的知识 and 领悟，现在已经基本可以在英语出版物中找到。但在其他语言中，这种知识的获取来源依然非常稀缺。而且，在其他语言中，与相关的英文术语精确对应的语词几乎从来就不曾存在。即使是用英文进行的研究，早期也存在概念和术语不足或空缺的问题。这种情况使得将现有的英文文献翻译成其他语言变得更为困难。

在为获取非暴力抗争的知识和领悟所做的努力中，研究者们不得不而且已经发明了新的术语，同时修改了相关术语的定义。<sup>17</sup>这方面的进展使得重要的关键性概念和想法的沟通更容易实现<sup>18</sup>。某些关键术语和一些重要文本已经翻译成其他某些语种，译文可以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网站上找到。

这里所推荐的关于非暴力行动的大多数读物，都是由一位作者所写。令人遗憾的是，这就是目前的进展，反压迫的非暴力抗争这个课题，一直没有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充分研究和思考。不过，我选择这些读物，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并非作者。就这些推荐读物的内容而言，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作者在相同问题上有同等程度的研究作品。这里未列出的、已经发表的其他一些非暴力抗争研究作品，可以作为后面的补充读物使用。

---

<sup>17</sup> 参阅吉恩·夏普，《公民抗争词典》（*Dictionary of Civilian Struggle*），新书，待出版。（1975年已经出版）

<sup>18</sup> 《非暴力抗争翻译指南》（“A Guide to Translating Texts on Nonviolent Struggle”），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网站（[www.ainstein.org](http://www.ainstein.org)）可下载。Error! Hyperlink reference not valid。

我这里对推荐读物的选择，是基于这样一个看法、预设，就是读者主要对在将来运用非暴力这一技术反抗专制政权感兴趣。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些读物对于准备面对其他类型的尖锐冲突可能也是有用的，特别是那些旨在反对社会、经济压迫以期用更公正的政策、制度取而代之的冲突。

如果碰上这样的时候，即人们认为自己准备好了、要行动的时候，奉上一套指导性读物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困惑、甚至反感。这是一种屡见不鲜的普遍反应。

那些已经在考虑在未来使用非暴力抗争的人，通常会认为自己充分理解了这一抗争方式选项，没有必要花时间去阅读更多的东西。实际情况几乎从来不是这样。

这种态度或习惯，往好了说，是战略规划不足的前因；往坏了说，是灾难的先兆。

## 国外帮助？

有的人认识到他们对非暴力抗争缺乏深度了解，于是便寻求外部人士指导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有可能会找到热切地想指导和提供帮助的个人或组织。然而，接受这种帮助有时可能是危险的，像没有深入理解非暴力抗争就进行非暴力对抗一样危险。提供帮助的外人不可能对特定的冲突情境、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历史背景有深切了解。你找到的外部人士甚至可能对非暴力抗争都没有深入理解。他们所提供的指导或许是不明智的，有可能导致失败和大规模伤亡。

此外，外部帮助并不是在提升抗争者自身的能力与力量接受外部建议解决自身诸多困难的会一直依赖他人来应对他们的问题。

还有，外人提供的指导的有时可能主要是出自自身的动机，也就是为了实现那些前来给予建议的外部团体、组织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为了实现受压迫的民众的目标。请求外人指导抗争者应如何做，有时甚至会导致抗争的控制权落在外人之手，而且，肤浅、表面的建议会造成巨大伤害。

有时，主动帮助非暴力抗争团体的外人也会为常常处于经济困难中的抵抗者提供财务资助。这种情况下，抗争者要极其谨慎。

那种财务资助可能由个人、组织提供，也可能是情报机构提供的。将来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明朗，你发现那些财务资助是跟这种或那种控制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抵抗者接受那些控制，那他们就会失去决定自己行动方向的能力。如果他们不接受控制，财务支持可能会被切断。财务援助若来自于外国的情报机构，赞助国政府的政策变化也可能会导致资助突然中断。

另外，提供资助的情报机构及其政府过去可能玩弄过最恶劣的“肮脏伎俩”，那种纪录使得民主解放运动与它们的任何关联，都可能遭到质疑是否明智，大大增加了解放运动的脆弱性。抵抗者受到外国情报机构资助，这种事情如果被揭露出来，可能会严重玷污解放运动，帮助对手损害抵抗者声誉、将抵抗者贬斥为外国政府的工具。这可能会对接受资助的抵抗运动的工作，产生严重影响。

## 寻求深度知识

如果没有足够的背景 and 知识，就试图为未来非暴力冲突做战略规划，这就如同一个急于求成的年轻学生不读关于化学的专业著作，就走进化学实验室、把未知的元素和成分胡乱混合在一起。缺乏非暴力行动深度知识的人所推荐的行动方案，很可能给运动造成巨大破坏。

从事传播非暴力抗争知识的工作，也需要有一个类似于“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sup>19</sup>的承诺：第一条，不要造成伤害。为了要谨记这一警示，有必要知道什么会损害非暴力抗争的实施、运用。

为了达到深度理解非暴力行动这一要求，应把主要关注点放在对这项技术现有研究作品的研读、审视上。以下这些指定的读物，是严格按照推荐阅读的顺序列举的。在这些读物中挑挑拣拣，改变阅读顺序，用其他读物替代，或跳过某些读物，都是不明智的。以

---

<sup>19</sup> 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是西方新入行的医生需要做的宣誓，代表了医生的职业伦理。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的著名医生。有记载说誓言的第一条是不要给病人造成伤害，不过并不见于现代版完成誓词——译者注。

后再读额外的、不同的读物，或许是有用的，但目前还不需要。除非特别说明，这里列举的读物都是基恩·夏普所著。

### 入门读物

关于专制政权面对非暴力抵抗时其脆弱性的分析：阅读“要有信心面对专制政权”，《社会权力与政治自由》，第 91—112 页。页数：21。

这本书有关于非暴力行动的简要、入门介绍：《确有现实的替代选项》，第 1—48 页。页数：48。

要探索应对专制政权切实可行的方法，阅读：《从专制到民主》，第 viii—x，1—90 页。页数：93。

### 中级读物

对非暴力行动的权力分析：罗伯特·L·赫尔维，《战略性非暴力对抗》，第 ix—xii，1—45，及 67—86 页。页数：69。

更多有关冲突中的非暴力行动：《开展非暴力抗争》，第 13—65，359—430 页。页数：125。到此总页数：436。

### 制定战略计划和选择方法的读物

有关战略规划的介绍，再阅读：《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 492—495 页；  
《开展非暴力抗争》，第 433—446 页；赫尔维，《战略性非暴力对抗》，第 87-  
99 页。页数：31。

关于消除压迫政权的权力来源，阅读：《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 11—12 页和第 744—755 页。页数：14。

关于政治权力的再分配，阅读：《开展非暴力抗争》，第 423—430 页。页数：8。

拟定战略的指南见于：《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 495—510 页；和《开展非暴力抗争》，第 433—508 页。页数：102。

关于如何以最小伤亡和最大效力根除压迫的讨论，阅读：《社会权力与政治自由》，第 161—179 页。页数：19。

关于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阅读：《社会权力与政治自由》，第 21—67 页。页数：47。

有关抗争策略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的分析，阅读：《社会权力与政治自由》，第 309—378 页。页数：70。

有关非暴力行动其他方面的讨论，阅读：赫尔维，《战略性非暴力对抗》，第 101—143 页。页数：43。至此总页数：770。

这些读物对于规划抗争以反抗根基深厚的压迫政权，将会提供非常有用的知识、理解。对于这类政权，除非进行一场抗争，它们是最不可能放弃其控制和支配的。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知识与资讯充分的行动，可以大大增加抗争成功的概率，同时减少伤亡。

这里的设想是，抵抗计划的制定至少部分地是建立在战略评估的基础上。在一场重大的非暴力对抗中，双方的权力、力量潜能和实际动员起来的力量肯定会发生变化。因而，

需要对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给予持续的关注。当一方或双方的实际权力、力量发生改变时，明智的做法是进行新的战略评估，并据此为下一阶段的冲突制定种种计划。

明智的非暴力抗争比其他手段更有可能实现解放，因为运用这抗争方式可以将有效的权力扩散到全社会。这种权力、力量的扩散，会以两种方式发生：

- 民众获得熟练应用这种抵抗行动的经验，因而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反抗任何当下的或未来的压迫。
- 非暴力抗争的应用会加强并有助于创造国家控制之外的独立机构。我们可以把这些机构和团体称为“聚力点”（loci of power），即权力、力量存在并从那里发出、运用的“地方”。这些机构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成为有组织抵抗的基地。个人反抗可能是高尚的、英勇的，但要想成功地结束压迫，需要集体的抗争。

然而，应当提醒的是，有效的抗争战略并不会因为研习这些读物而自动产生。这些按顺序推荐的读物可能非常有帮助，但是仅凭它们并不能保证读者会制定出明智的战略。读者还需要其他的知识和能力。

### (3) 战略性思考和规划的能力

那些希望制定一个明智的战略以消除压迫的人，需要通过以下方式提高其诸种能力：

- 他们需要研习为战略规划推荐的读物；
- 他们需要自己思考、明智地计划；
- 他们需要做好准备承担责任；
- 他们需要提高自己的战略思考能力和制定战略的能力；

换言之，规划者们需要思考自己所在的群体、组织如何行动，才能让抵抗参与者们的努力确实能促进设定的目标之实现。所有这些都应该在专制的或宰制性的对手抗争的具

体情境中完成，这类对手有意愿也能够进行残酷的镇压。所谓“战略性思考”，意味着盘算如何以这样的方式来实际地采取行动，即改变局势从而使得期待的目标变得更可能实现，这与仅仅坚称那个目标是值得追求的，或宣布反对当前的制度，是很不相同的一件事。

盘算如何实现长期目，包括盘算采取哪些行动可以更接近实现期待的目标。为长期的总体战略做规划，需要深入仔细关注那些未来可以预期的有限或局部的战役性行动。

这种总体计划应包括长期对抗如何开始，种种活动如何开展，以及次级战略与单项行动——它们是为了解决有限、较小问题或者说议题的战略与行动——应如何促进最终实现主要目标。

战略性思考还意味着需要学习如何反制对手可能会采取的行动，以及反制任何希望非暴力抗争失败的人或群体所可能采取的行动。

### 基本战略考虑：对手的权力、力量来源

要制定实际可行的战略计划，需要找出对手的权力、力量来源，并察考、深思抵抗参与者们是否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如何才能减少或切断那些权力来源。

在塞尔维亚，在计划破坏米洛舍维奇专制时，斯尔贾·波波维奇和他的同事们专注于已知的、任何统治者都有的六个政治权力来源。

**再读：《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 11-12 页，和第 744-755 页。**

已知的六个权力来源是权威（合法性）、人力资源、技能和知识、无形的因素、物质资源以及制裁（惩罚）。民众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协助、服从与合作，为统治者提供了所有这六种权力来源。那些向统治者提供必要的权力来源的团体和机构，被罗伯特·L·赫尔维称为政权的“权力支柱”。

这些团体与机构并不一定会永远为政府提供权力来源。它们支持政权的程度总会有变化，而且可能会故意改变。当支撑性柱石变得不可靠时，当它们缩小甚至切断那六个权



力来源的供应时，压迫政权就被削弱了；当必须的权力来源被切断时，压迫政权就可能变得无权可用以及解体。

这些深度的见解与塞尔维亚的经验表明，反抗者制定战略时，一个主要的考量因素，是每一次抵抗行动是削弱了还是加强对手的权力、力量。这也适用于评估有限的战役性行动所可能采取的战略和争取的目标。

上述关于统治者权力来源的原理，反过来就抵抗者方面而言，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抵抗者的权力、力量来源，经由每次有限的战役性行动，会得到加强还是削弱？

这些问题，战略规划者必须严肃对待、考虑。

### 基本战略性考量：依赖关系的平衡

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合作行动（也叫抵制），是非暴力抗争可以采用的几类主要方法。

这些方法的采用，只有在被抵制的商品、服务和其他权力来源的确是压迫政权所必需的，而且只能依赖抵抗者才能获得的情况下，才会对那个政权产生重大冲击。如果对手对某种资源非常依赖，那么限制或者切断其供应的不合作，就可能非常有威力。如果双方都要依赖对方获得某种重要产品、资源，那么对抗很可能会变得远为复杂。这些现实情况，在计划抵抗战略时必须仔细考虑。

依赖关系的分布和平衡，将强烈影响不合作行动所能产生的冲击力。因此，在做战略规划时，需要回答下面这些问题：

- 哪一方依赖另一方提供必需的物品、服务和权力来源？依赖到什么程度？
- 依赖关系完全是单向的，还是双方彼此严重依赖？
- 依赖方是否有或者能否创造出替代性的东西，来取代那些因对方不合作而减少或被切断供应的物品、服务和权力来源？

## 基本战略考量：公民社会的现状如何？

第三个需要考量的主要因素，是社会中的独立群体、组织和机构的状况，即前面提到的“聚力点”。在准备战略草案，以及以后在公开对抗中运用那些战略时，都应重点考虑这些不在国家建制控制下的组织、机构。

这些聚力点可能有各种不同目标，其中很多可能完全是非政治性的。有些则明确是政治性的。这些聚力点所可能运用的权力潜能，可能只是启蒙性的（如教育），或者也是可能动摇体制的（如公务员的不合作），甚至可能终结压迫（对手的行政和和执法体系的瓦解）。

这些团体和机构累积起来，通常被称为“公民社会”。如果一个社会形成了众多并且有实力的这种聚力点，它们就可以成为民主化抗争中提升人们权力与能力的基础。这些聚力点会非常有助于参与抵抗的民众采取不合作行动，以限制或切断政权的权力来源。通过促进团结和提供支援，这些实体也可以帮助民众承受极端残暴的镇压。

如果一个社会不具备众多而且有实力的这类聚力点，这一弱点或者说缺失，在规划总体战略和局部的、战役性运动的单项战略时，必须考虑在内。因此，旨在结束专制统治的长期抗争的早期步骤，应该是非常有限、高度谨慎地出场的。

如果这种长期抗争要壮大到足以终结压迫，聚力点的存在、涌现或者刻意被创造与动员起来，几乎可以肯定是必要。因而，创造或加强这类聚力点，必须成为抗争运动的优先考虑。

在1956—1957年匈牙利革命期间，当匈牙利军队试图与苏联军队作战之际、在抗争转变为军事手段之前，这种聚力点以各种“委员会”形式涌现出来。在军事抗争被粉碎后，抗争者依靠那些聚力点发动了第二阶段的非暴力抗争。

总而言之，战略起草人必须关注聚力点的地位和状况。

## 基本战略考量：运动目标与行动是否会加剧压迫体系的弱点？

在制定总体战略和局部的战役性运动战略时，第四个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设定的目标与行动是否会加剧极端专制或其他压迫制度所固有的弱点。

与大众的想法、印象不同，极端的专制和其他统治体系并非像它们所表现出、所被认为的那样，是永远强大不变的。它们实际上有着种种内部问题和蜕变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问题与因素往往会削弱中央的控制力、威胁到政权本身的生存。能加剧这些政固有弱点的抵抗行动，较之于不能加剧的行动，很可能更具冲击力。

**有关极端专制政权的弱点清单，阅读：《社会权力和政治自由》，100—101 页。**

**页数：2。至此总页数：772。**

这个清单意味着一个操作性的设想，就是那些加剧专制政权既存脆弱性的行动，要比没有这种效果的行动，对专制政权会产生更加严重的不利冲击。

### 基本战略考量：冲突中主动权的重要性

为了实现有效的非暴力抗争，抗争者应该一开始就抓住主动权，并在冲突过程中保持主动，他们不应容许自己沦为主要是对于对手的行动作出反应的角色。

即便起初的战略评估显示现政权极其强大而抵抗者看上去虚弱得多，保持主动权也是可能的。保持主动，在对抗的进攻阶段和防守阶段都是有意义的。

### 战略计划起草者的挑选

在构思用抗争结束压迫的某个时刻，将需要遴选出一些人负责撰写达到此目的的总战略建议草案。起草小组成员的选择必须非常谨慎，因为不是每个渴望参加的人都是最有智慧和最有技巧的人。没有读过有关该问题的基本读物的人不是合适人选。对本国及社会没有深入了解的局外人也不应参与起草过程。

所知甚少、教条或自我中心的人，如参与制定非暴力抗争计划，可能会导致灾难。另外，重要的是，参与规划者不能是这样的人，即他们有自己的、可能会干扰规划过程的图谋与计划。

从正面来讲，起草者必须是已经展示出战略性思考和计划能力的人。大多数人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并不具备这一能力。

当然，正如本文件前面所述，只有在大量阅读、反思和思考之后，才能启动起草过程。

最重要的是，起草人员应该既有能力制定总体战略，也有能力为局部的、有限的战役性行动制定单项战略。

极端压迫的严重性将使战略起草小组的组成和运作变得极其困难，而且常常很危险。有些人或许需要躲避抓捕。抵抗者常常很难会面。抵抗者当中也可能有告密者，或者有安全机构安插的奸细。

不过，抵抗运动的规划小组有时候能够在他们也意想不到的地方展开运作。在被纳粹占领的挪威，12个在首都开会的人构成了那个国家抵抗运动的秘密领导小组。在德国本土，一些人进行密谋策划刺杀希特勒。在柏林的盖世太保总部附近，数千女性在一个临时监狱外集会，要求释放她们的犹太丈夫，竟然获得了成功。

在一些情况下，流亡海外可能有帮助。通讯方面的新技术也可能有助于精心制定计划。

质疑者或许会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前从未有人为通过发动非暴力抗争实现解放，做过如此规模和深度的战略计划。他们甚至可能声称，没必要进行这样的规划。

但进行战略规划是可能的，比人们能预期的更经常有可能做到。如果条件允许，计划预备小组的目的还可以是形成一份总战略草案，然后由一个扩大的团队进行评估。

在一些严酷的形势下，可能无法做到将总战略草案提交给一个更大的团队评估。不过，在极端政权下，一个很小但明智的战略小组有时候也能制定并传播指导性的行动计划。他们的建议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检验，即号召民众参加一个细小但能引起关注的、相对安全、不需要进一步指示的行动，看民众有什么反应。这种反应可能是一个指标，说明是否还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发生反抗的升级，或者说明民众是否已经准备好采取有更大风险的行动了。

如果有可能对总战略草案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可以是批准草案，或退回修改，或搁置、要求提出一个新的总战略建议草案。

## 基本战略决定

战略规划小组商议计划的早期，需要决定、至少是暂时决定，要采用哪种非暴力行动的机制，即：是转变对手，是获得退让，还是非暴力强迫，甚或是解体对方。如果要对抗的是独裁政权和其他严重压迫的情况，焦点将几乎必定在是实行非暴力强迫、还是解体对方。

准备总战略草案的人员，必须考虑单独一场大规模、有纪律的不合作与抗命，是否有可能瓦解强大的专制政权或其他压迫体制的。不过，一场抗争就解决问题，那种情况是罕见的可能性也远为更难确定。如果判断一场抗争解决不了问题，规划小组就应计划如何才能开始终结专制压迫所需要的那种抗争，以及计划如何聚焦、展开有限的抗争。

有限的战役性抗争行动所针对的问题或者说议题，应该是可以引起民众广泛支持的。而且，它们应该是一看就可见明显是正当的、是当局难以驳斥否定的。那些议题通常也应该是当权者可以勉强让步的议题，或当权者可能会被激发出力量的人民击败的议题。

计划者需要很谨慎地选择运用于各个阶段对抗的种种行动方式。非暴力行动技术的方法库中有各式各样的抗争方式，但在某个特定冲突中，并非所有方法都是明智的选择。有些方法将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只有少数能有力地帮助抗争获得成功。即将使用的抗争方应该要有助于实现抗争目标，有助于贯彻选定的战略。

**有关抗争方法的选择所涉及因素的讨论，阅读《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 501—504 页。页数：4。**

然后，随着对抗的发展，行动规模与运动的具体目标是可以扩大的。政权的反制措施，特别是镇压，也可能会变得更残酷，尤其是当抵抗运动给压迫政权带来越来越严重的代价时。

通过阅读本指南所安排的读物而能获得的知识和领悟，将有助于计划制定者确定他们还需要承担其他更多的哪些任务和规划。

## 拟定一个总体战略

对于抗争所围绕的问题或者说议题的考量，以及抵抗者能使用的有利条件、手段的考量，应该用来指导总体战略各个主要特性的形成。需要考量的因素包括：

- 双方阵营的优势和劣势有何差距？
- 针对哪些问题采取行动会是极其重要的？
- 抵抗者有哪些可以使用的主要有利条件、手段、杠杆？
- 选择的抗争议题与可用的有利条件、手段、杠杆是否匹配？
- 如何将抵抗者可用的有利条件、手段与总体战略的形成联系起来？
- 如何将抵抗者可用的有利条件、手段与已经找出的、对手的弱点联系起来？
- 专制政权的哪些权力支柱，如果抵抗者运用可用的有利条件、杠杆，容易受到破坏？

所有这些更进一步的、拓宽了的知识与领悟，将有助于战略规划者制定明智的总战略。

抗争总战略开发完成后，将为指挥、进行未来的对抗奠定框架。具体的战术和方法也是重要的，但与总战略相比是其次的。

关于战略规划涉及的基本要素的讨论，再读《非暴力行动的政治》，第 495—510 页。

关于冲突过程中战略性议题与原则的介绍，阅读：《开展非暴力抗争》，第 447—508 页。至此总页数：838。

总体战略计划草案的第一稿，或许最初是由几个人的思维指导形成的，但定稿则可能要由一人或一个团队来准备。草案一旦完成，将需要由更大的团队进行审阅，更大团队的各个成员都需要已经研读完所有指定读物。如果总体战略的草案被认为不合适，那么可

能需要重写，或者要至少进行重大修改。然而，如果草案被认为大致思路正确，在这个阶段或许只需要进行相对有限的调整即可。

如果制定了明智的总战略并运用巧妙，那么抵抗者就有很大的可能性发展出一场有效的解放运动。

## 自我提升权能

在很多情况下，相对而言，生活在极端压迫下的民众往往感觉自己软弱无力、无法对抗统治制度。这项任务往往被认为太大、太难，也太危险。人们感到克服如此大的困难而赢得胜利的几率很小。民众宁愿更专注于为尽量提高生活水平所需要进行的简单努力。因此，受压迫的民众很大程度上是被动、消极的。

这种状态一直被错误地称为“冷漠”。实际上，这是无助。

当人们感到无助时，在给出行动建议时，需要有关爱、同情心。如果还在这样的阶段，人们却被促使进行超出其能力的公开对抗，那么，可以预料会遭受的失败，将会成为给他们的证据，证明他们的弱小无力比自己之前意识到的还要严重。他们会经历很长时间后才可能再次愿意采取行动。

然而，在他们能力范围内的、有限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那种行动更有可行性。摩苏亚·帕特里克·莱科塔在1990年的报告<sup>20</sup>中指出，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一个主要抗争阶段，却不可能动员非洲民众采取行动对抗令人生畏的高压统治。

莱科塔继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非洲人创建了公民组织，例如索韦托公民协会（Soweto Civic Association），为实现小目标而进行抗争。这些公民行动组织挑选出可针对的具体议题，例如“没有水可用，或者……没有足够的电。人们不得不避免涉及‘政治’这个词……但人们都可以去说：‘政府必须给我们水……’”

---

<sup>20</sup> 摩苏亚·帕特里克·莱科塔（Mosiua Patrick Lekota），当时是联合民主阵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的成员，在1990年2月8—11日麻州剑桥举行的“冲突与防卫中的非暴力制裁全国研讨会”中发言，该研讨会由爱因斯坦研究所资助。

就这样，有个地方的非洲人被鼓动组织起来，去争取有一口井以提供清洁的水，那里的大人和孩子都曾因喝了被污染的水而生病。在这一议题上，非洲人采取了行动，并获得了成功。通过自己的行动，他们变得有了权能，也获得了实现更大目标的信心。

其中的教益在于，在抵抗强大的压迫时，从大问题中抽取出有限、具体的小问题而进行抗争，经常是明智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小心选择有限的攻击聚焦点。如果一个可能的聚焦点可以很容易被人指责为是不可取的，那么就需要拒绝考虑。所选的具体问题必须一看就明显是正当合理的<sup>21</sup>。

抗争者的力量要以更可能获胜的方式、集中用于攻击对手最薄弱的节点。

**有关形成攻击焦点的讨论，阅读《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第 471—473 页。总页数：3。**

普通民众在长期对抗开始之初，就调动他们的潜在权能以转化为有效的力量而言，可能只是在获取自信也获取经验的阶段。在这个时间段点上，民众如取得有限的胜利，既有可能消除某些具体问题，同时也能提升大家的权能。这将大大增加实现解放的机会。

在一些不那么极端有无助感的境况下，将诉求具体化可能仍然对抗争有很大帮助。所以，甘地在 1930 年计划一场以印度独立为目标的运动时，提出了包括废除盐税在内的 11 项具体要求。“印度国民大会”的领导者们对此持怀疑态度。而甘地坚持认为，这些要求一旦实现，就意味着实质上的独立<sup>22</sup>。事实证明，争取具体目标的抗争有助于动员印度民众，同时也能削弱英国的殖民统治。

在几乎所有的解放抗争中，长期冲突都需要分阶段进行，每一个阶段都要建立在前一阶段的努力之上，与民众的行动能力与形势要求同步。每一个阶段的完成，都可以借助于实现单一目标或很少量目标的战役性抗争。

---

<sup>21</sup> 见吉恩·夏普，《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第 471—473 页。

<sup>22</sup> 见吉恩·夏普，《甘地用道德力量做武器》（*Gandhi Wields the Weapon of Moral Power*），亚美达巴德出版社（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1960 年，第 59—60 页和 71—72 页。



对于每一场战役性抗争，战略规划者都需要选择一个或者很少的几个打击点。那些打击点必须是象征“邪恶”的更大问题之某些具体方面，也必须是最缺乏正当性而且可以动员最大力量来反对的方面。

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一场围绕有限问题的小型抗争可能会意外引发强烈的不合作和反抗，由此产生的力量会扫荡整个压迫系统。然而，未来战略的规划者不应该指望这样的事会发生。

另一种很少见的情况是，民众可能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可以跳过针对具体的不公正问题的运动，随时准备采取行动结束压迫制度。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在 1991 年的独立抗争就是这样的例子。然而，这是极为特殊的情况。在绝大多数时候，抗争者还是需要发动针对具体、有限议题的抗争行动。

## 解放运动的升级

在反对专制和其他压迫的长期抗争中，早期应当开展实现有限目标的小规模行动。这些行动应该是低风险且可在短期内实施的。这些行动能引起关注，触发长期斗争，而且，时常可以做到不会将参与者置于极端危险当中。这些小规模行动不仅可以在具体议题上有所收获，而且有利于推动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某些有限的转变。

然后，随着对抗的发展，行动规模和运动的具体目标或许都会扩大。政权的应对措施，特别是镇压，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酷。抗争给压迫政权造成的损失越大，镇压通常就会越残酷。

制定出的战略必须可以直接或间接削弱此前讨论的高压政权的权力支柱，限制或切断高压政权必要的权力来源。这种情形就发生在塞尔维亚人对米洛舍维奇的抗争中：首先，政权的合法性被消除；然后，民众从被动消极转向不合作和反抗；最终，政权的镇压力量变得不可靠。当专制的权力来源被切断时，政权就面临崩溃了。

**这一切**是否会发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抗争者制定的战略是否明智，以及它能否得到熟练巧妙地实施、运用。

## 迈向这个可能的步骤

尽管困难重重，这些行动尚在所谓的普通人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们可以学习、思考、努力，建立自己的权力、力量基础，以及干练地进行准备。战略规划者必须盘算他们要做什么才能实现目。然后，就必须勇敢地采取行动了。抵抗者必须有系统、有条理、一步步向着他们的目标前进。如果这一切能够做得明智又巧妙，由此所获得的经验将可以让受压迫的人民对他们自我解放的能力变得更有信心。

本文件要探讨的，一直是人们如何能够超越过去的经历，不再寄望于那些可能永远不会出现、或者并不总那么明智的“大救星”。

- 在反抗哪怕最残暴的政权时，人们如何提高可以延续下去的成功几率同时最小化伤亡？
- 人们如何才能解放自己并发展能力来防止压迫制度的重来，以及进而建设一个更自由、民主、公正的社会？

本文件为战略规划所提出的种种建议，是为了让旨在削弱或推翻压迫制度的非暴力抗争，能比过去随机发生的、没有计划的抗争更有效。

## 阻止新的专制

如果抗争者的目标是以更民主、自由、公正的制度来替代压迫制度，那么，也有必要计算、筹划如何防止最初的成功被一场政变窃取。政变可能发生在抗争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对抗即将结束时。

当专制或其他压迫被严重削弱，当权者表现出犹豫不决的迹象，或者在消灭民主运动的努力中犯下这种那种错误，政变就有可能发生。有时候，政变可能由体制内人士发起，

如 1981 年 12 月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波兰发动的政变。在“团结工会”大规模非暴力抗争中，事情变得很明显，即使是共产党也不再可靠了，相反，到了崩溃的边缘。

有些政变是为了严厉地粉碎非暴力抗争运动，以维持保住专制政权。1988 年 9 月，缅甸就发生了这种政变，那时非暴力抗争已经先后导致了三个由军方控制的政府的倒台，而民主运动领导者们无法就谁领导新的民主政府达成协议。

另一种可能性是，在成功地削弱专制政权后，一个有自己动机和目标的不同群体可能试图趁政局不稳之际夺取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他们的目的可能是让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1917 年 10 月，布尔什维克继以非暴力抗争为主的二月革命成功终结俄国的沙皇统治后，就发动了这样的政变。

争取民主变革的非暴力抗争战略规划者，需要在他们的规划中如何防止与击败政变的内容，而无论政变所宣称的目标是什么。

**防止和击败政变的分析与战略在此：吉恩·夏普和布鲁斯·詹金斯，《反政变》，第 1—59 页。页数：59。总页数：900。**

## 解放，但不完美

成功地推翻专制或其他压迫，不会立即产生一个近乎完美的新制度。然而，这将是相比过去的巨大进步，旧秩序将会基本消亡。新的政治秩序将会提供机会让进步的改良成长、成功，以顺应社会的可能需求和民众的选择。通往建立一个可长期存在、自由、民主和参与的制度的道路，已经被开辟出来。

要想以这个机会为基础促进社会的持续改进，还需要做出很多进一步的努力<sup>23</sup>。这些努力包括：

---

<sup>23</sup> 有关非暴力行动的一个主要用途是如何促进社会中有效力量的扩散的讨论，见吉恩·夏普，《社会力量和政治自由》，第 309—378 页。

- 准备阻止和击败这样一些新企图，即企图推翻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给人们带来的民主权能，而强加新的压迫；
- 加强与振兴现有的公民机构、组织；
- 建立更公平的新机构、体制，并普遍加强公民机构、组织的能力，以满足国家体制之外的社会需要。

在解放运动的最初胜利之后，所有这些进一步的努力，其难度都将会比在旧政权之下要小得多了。

而且，民众也将在进行有效的非暴力抗争方面比以前更有经验。此外，民众已经强化了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组织，人们可以借助它们来应对旧体制的残留问题，以及成功地应对新的挑战

这份指南所提出的任务，对于希望为生活在专制或其他压迫下的人们获得解放而制定一个战略计划的个人与团体，是非常艰巨的。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气馁，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这些任务，并实际上能为他们自己的解放预备好这样一个战略计划。

然而，利用这些拓展了的知识和领悟，并通过一步一步的努力，曾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将被发现是一系列可以实现的任务。

为了实现解放这一总目标，这样的努力付出是值得的。

通过缜密的分析与仔细的计划，以及有纪律、勇敢的行动，是有可能摆脱压迫制度、迈向一个以责任和自由为基础的更良性的社会的。

## 附录一 阅读资料

罗伯特·赫尔维 (Robert L. Helvey)，《战略性非暴力对抗》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波士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2004 年。

吉恩·夏普和布鲁斯·詹金斯 (Bruce Jenkins)，《反政变》 (*The Anti-Coup*)。波士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2003 年。

吉恩·夏普，《从专制到民主：解放的概念性框架》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Liberation*)。曼谷：缅甸民主重建委员会 (Committe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 in Burma)，1993 年。波士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2003 年和 2008 年。

吉恩·夏普，《社会权力与政治自由》 (*Social Power and Political Freedom*)。波士顿：扩展新视野书局 (Extending Horizons Books)，波特·萨金特出版社 (Porter Sargent Publishers)，1980 年。

吉恩·夏普，《非暴力行动的政治》三卷本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3 Vols*)。波士顿：扩展新视野书局，波特·萨金特出版社，1973 年及此后的印刷版本。

吉恩·夏普，《确有现实的替代选项》 (*There are Realistic Alternatives*)。波士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2003 年。

吉恩·夏普，《开展非暴力抗争：20 世纪的实践与 21 世纪的潜力》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20<sup>th</sup> Century Practice and 21<sup>st</sup> Century Potential*)。波士顿：扩展新视野书局，波特·萨金特出版社，2005 年。



## 附录二

### 非暴力抗争重要术语表<sup>24</sup>

**让步/妥协 (Accommodation)：**非暴力行动中的一种促变机制，即对手在仍有选择的情况下，决定同意达成妥协、满足非暴力抵抗者的某些要求。退让发生时，对手既没有改变观点，也没有被非暴力强迫，只是认为妥协解决是可取的。

退让妥协可能是各种影响的结果。如果继续下去的话，这些影响可能会导致转变（conversion）、非暴力强迫、或者对手制度或政权的瓦解

**权威 (Authority)：**指这样一种特质，它导致某些个人与机构的裁断、决议、建议和命令被他人自愿接受为正确的、并因此得到他人的服从或合作而得以实施、执行。权威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但并不等同于政治权力。

**抵制 (Boycott)：**在社会、经济或政治方面不合作。

**公民弃权 (Civic Abstention)：**政治不合作行为的同义词。

**公民行动 (Civic Action)：**为政治目的而采取的非暴力行动的同义词。

**公民抗争 (Civic Defiance)：**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有坚定主张的非暴力抗议、抵抗或干预行为。

**公民罢工 (Civic Strike)：**为政治原因而进行的经济方面的停业。不仅工人可以罢工，重要的是，学生、教授、店主、白领工人（包括政府雇员以及社会上层成员通常也会参加。

---

<sup>24</sup> 该文本是为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目的而分发，未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位于麻州波士顿纽伯里街【Newbury Street】427号，邮编：02115-1801）的吉恩·夏普许可，不可出版或翻译。这些术语数量非常有限，节选自一份目前还在准备中的、长得多的手稿。2002年6月17日。

**公民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故意并和平地违反特定的法律、法令、规章、条例、军令或警令，等等。

这些法律通常本质上被认为是不道德、不公正或残暴的。然而，人们有时候可能不遵守规则或道德大致中性的法律，以此作为反对政府更广泛的政策的象征。

**公民抵抗 (Civil Resistance)：**非暴力抵抗 (non-violent resistance) 的同义词。

**转变/转化 (Conversion)：**对手在遭到非暴力行动抗议后所发生的观点改变，他们转而相信，正确的选择是接受非暴力团体的目标。这是非暴力行动的四种变化机制之一。

**解体 (Disintegration)：**非暴力行动的第四种变化机制。在这种变化机制中，对手并非只是简单地遭到强迫，由于民众的不合作和反抗，结果他们的体制或政府被解体、崩溃。权力来源因不合作而遭受的限制或切断达到了某种极端程度，因而对手的体制或政府消散、瓦解了。

**经济停摆 (Economic Shut-Down)：**一个城市、地区或国家的经济活动暂停，其规模足以造成经济瘫痪。通常出于政治性动机。

通过工人大罢工，同时管理层、企业、商业机构和小店主关闭他们的机构和停止经济活动，可以实现经济停摆。

**政治自由 (freedom, political)：**它是一种政治条件，这种条件允许个人拥有选择和行动的自由，也允许个人和团体拥有参与社会与政治体系之决策与运作的自由。

**总战略/大战略 (Grand Strategy)：**在冲突中如何通过选定的行动路线来实现目标的、涵盖面最广的构想。总战略的功能在于协调和指挥反抗阵营中一切适当、可用的资源（人力、政治、经济、道德，等等），以实现冲突对抗争取的目标。

在总战略的框架下，可以采取若干局部战略，去实现整体抗争各附属阶段的特定目标。



**受压/受虐群体 (Grievance Group) :** 指的是这样的普通民众群体，即他们的苦难与不满 ( ) 成为冲突中的议题并得到非暴力抵抗者们的支持。

**人力资源 (Human Resources) :** 该术语用以指代那些服从“统治者” (指控制国家的统治集团)、与统治集团合作、或帮助统治集团实现其意志的个人或团体，包括这些人和团体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他们的组织程度、形式和独立性。

统治者的权力受这些人人力资源之可调动、利用程度的影响，构成了政治权力的来源之一。

**物质资源 (Material Resources) :** 这是政治权力的另一个来源。该术语指财产、自然资源、金融资源、经济体系、通讯手段和运输方式。统治者对这些资源控制或者没有控制的程度，有助于决定统治者的权力程度或限度。

**促变机制 (Mechanism of Change) :** 在非暴力抗争的成功案例中，变革发生所依赖的程式、过程。这四种机制是对手转变、对手退让、非暴力强迫和对手解体。

**方法 (Methods) :** 非暴力行动技巧中的具体行动手段。迄今，已经识别、发现了近二百种具体的方法。它们被分为三大类：非暴力抗争和劝说、不合作 (社会、经济和政治)，以及非暴力干预。

**不合作 (Noncooperation) :** 非暴力行动的一大类别，指抵抗者们故意限制、中断或暂停与他们不赞成的人、活动、机构或政权，进行社会、经济或政治合作 (或者三者结合)。

不合作的方法可以分为社会不合作、经济不合作 (经济抵制和罢工) 和政治不合作等子类别。

**宗教或伦理上的非暴力 (Nonviolence , religious or ethical) :** 一些这样的信仰和行为类型，即基于宗教或伦理理由而禁止使用暴力的信仰与行为类型。在有些信仰体系

中，不仅身体暴力是禁止的，而且怀有敌意的思想和语言也是禁止的。一些信仰体系还要求向对手表现出正面的态度和行为，甚至拒绝“对手”这个概念。

这些信仰者可能经常会与出于实用主义原因而运用非暴力的人一同参加非暴力抗争，也可能会经常选择不参与这样的抗争。

**非暴力行动 (Nonviolent Action)：**一种普遍性的技术，在不使用身体暴力的情况下进行抗议、抵抗和干预。。这种行动可以采取下列方式：(a) 故意不作为——即参与者拒绝做他们通常做的行为，那些按习俗他们该做的、或法律法规要求他们做的行为；或(b) 特意作为——即参与者做了他们通常不做的行为，那些按照习俗他们不该做的、或法律法规禁止他们做的行为；或 (c) 二者结合。

结合。

这一技术包括诸多具体方法，它们可分为三大类：非暴力抗议与劝说，不合作，非暴力干预。

**非暴力强迫 (Nonviolent Coercion)：**一种非暴力行动促变机制。在 z 这一机制中，广泛的不合作和反抗而使对手失去对局势的有效控制，反抗者的要求从而得以违背对手的意愿而实现。然而，对手依然保留他们的官方地位，体制没有瓦解。

**非暴力叛乱 (Nonviolent Insurrection)：**通过大规模不合作和反抗、反对被认为是压迫性的现政权的一种民众政治起义。

**非暴力干预 (Nonviolent Intervention)：**非暴力行动方法的一大类别，在冲突情况下，以非暴力手段直接干预对手的活动和体制的运行。这些方法与象征性抗议和不合作都有区别。破坏性干预大多是身体上的（例如占地静坐），但是也可能是心理、社会、经济或政治的。

**非暴力抗议和劝说 (Nonviolent Protest and Persuasion)：** 非暴力行动方法的一大类别，表达反对意见或试图劝说的象征性行为（如守夜、游行或纠察）。这些行动超出了口头表达意见的范围，但没有达到不合作（如罢工）和非暴力干预（如静坐）的程度。

**非暴力抗争 (Nonviolent Struggle)：** 通过强有力的非暴力行动的形式发起坚决的冲突，特别是针对不肯退让改变的、可能会通过镇压来应对的对手。

**非暴力武器 (Nonviolent Weapons)：** 非暴力行动的具体方法。

**权力支柱 (Pillars of Support)：**

指这样的社会机构和部门，它们为现存政权提供需要的权力来源、使其得以维护与扩展其权力能量。

例如，警察、监狱和军队提供制裁，道德和宗教领袖提供权威（合法性），劳工组织和商业及投资群体提供经济资源，其他已知的政治权力来源也类似。

。

**政治反抗/抗命 (Political Defiance)：** 非暴力抗争的战略应用、目的在于瓦解专制并代之以民主制度。

这种抵抗通过不合作和反抗来调动被压迫民众的权力、力量，以限制和切断专制政权的权力来源。那些来源由被称为“权力支柱”的团体和机构提供。

成功地运用政治反抗会让一个国家无法被当前或任何未来的专制政权所统治，因此能够维护民主制度、抵御可能发生的新威胁。

**政治柔术 (political jiu-jitsu)：** 指这样一种特殊过程，即它在非暴力抗争中的展开能改变权力、力量（对比）关系。在政治柔术中，对手对非暴力抵抗者的暴力镇压所招致的负面反应，可以转而用于给对手带来政治上的不利，削弱他们的权力地位并加强非暴

力抗争者的权力地位。只有当暴力镇压遇到持续的非暴力反抗、而不是暴力回击或投降时，这才能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手的镇压会被人们视为最恶劣的行径。

由此，在第三方、广大受压群体甚至对手的一贯支持者中，都可能发生对对手看法的转变。看法的转变可能会导致撤回对对手的支持，同时增加对非暴力抵抗者的支持。结果，对手可能会受到广泛谴责，对手内部出现反对，同时，抵抗方得到增强。这些变化有时会产生有利于非暴力斗争团体的、重大的力量关系上的转变。

政治柔术并非在所有的非暴力斗争中都能运用。当政治柔术缺位时，力量关系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合作的程度。

**权力来源 (Source of Power)：** 这些是政治权力、力量的源头。它们包括权威、人力资源、技能和知识、无形因素、物质资源和制裁。这些都来自于社会。每一种资源都与民众和社会机构的接受、合作和服从密切相关，并依赖于它们。如果这些资源供应充足，统治者就会很强大。当这些资源供应被削弱或被切断，统治者的权力将被削弱或崩溃。

**战略性非暴力抗争 (Strategic Nonviolent Struggle)：** 根据一个战略计划进行的非暴力斗争，该计划是在分析冲突形势、冲突双方的优势和劣势、非暴力行动技术的性质、能量和要求，特别是这种类型斗争的战略原则基础上制定的。参见：总战略、战略、战术和方法。

**战略 (Strategy)：** 在整个对抗之总体战略框架中、为进行一个重大阶段或战役性行动所制定的计划。战略是对某一具体战役性抗争应该如何发展的基本想法，以及如何将战役性抗争各个孤立的局部结合起来以最有利地促进实现其目标。

战略在总体战略的范围内执行。战术和具体行动方法用于小范围活动中为某个具体运动执行战略。

**罢工 (Strike)：** 故意限制或暂停工作，通常是暂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目的而对雇主施加压力，有时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对政府施加压力。

**战术 (Tactic)：**它是基于这样一种构想的有限行动计划，即在冲突对抗的一个有限阶段如何有效利用可用的行动手段实现具体、有限的目标。战术所要达到的功用，是在整体冲突对抗的某个阶段执行一个更广泛的战略。

**暴力 (Violence)：**是针对他人实施的、会造成伤害或死亡的外在身体暴力，也包括威胁施加这种暴力、或任何依赖这种行为或威胁的行为

某些类型的宗教或伦理上的非暴力，对暴力的理解要宽泛得多。这里对暴力的定义要窄一些，它给这些宗教或伦理的信仰者留有空间，使他们可以与出于实用主义原因而准备进行非暴力抗争的个人与团体合作。

**政治权力 (Political Power)：**它是可以用于决定和实施对于社会的正式政策的、种种影响力与压力的总和。政治权力可以由政府机构使用，也可以由异见者团体和组织用来反对政府。政治权力可以在对抗中直接使用，也可以作为一种储备能力留待以后使用。

**制裁 (Sanctions)：**它们是惩罚或报复，包括暴力和非暴力性的，施加于人们没有以预期或期望的方式行事之时，或施加于人们以期待之外或禁止的方式行事之时。

与暴力性制裁相比，非暴力制裁要更少可能是对不服从命令的简单报复，而更有可能就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制裁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来源。

**依靠自己 (Self-Reliance)：**它是这样一种能力，即管理自己的事务、做出自己的判断，并为自己、自己的团体或组织提供独立性、自决性和自给自足性。

**技能和知识 (Skills and Knowledge)：**政治力量的一个来源。支持统治者的力量来自社会中的个人和团体提供的技能、知识和能力（人力资源）以及统治者对这些可用的技能、知识和能力的需求关系。

**权力来源 (Source of Power)：** 这些是政治权力、力量的源头。它们包括权威、人力资源、技能和知识、无形因素、物质资源和制裁。这些都来自于社会。每一种资源都与民众和社会机构的接受、合作和服从密切相关，并依赖于它们。如果这些资源供应充足，统治者就会很强大。当这些资源供应被削弱或被切断，统治者的权力将被削弱或崩溃。

**战略性非暴力抗争 (Strategic Nonviolent Struggle)：** 根据一个战略计划进行的非暴力斗争，该计划是在分析冲突形势、冲突双方的优势和劣势、非暴力行动技术的性质、能量和要求，特别是这种类型斗争的战略原则基础上制定的。参见：总战略、战略、战术和方法。

**战略 (Strategy)：** 在整个对抗之总体战略框架中、为进行一个重大阶段或战役性行动所制定的计划。战略是对某一具体战役性抗争应该如何发展的基本想法，以及如何将战役性抗争各个孤立的局部结合起来以最有利地促进实现其目标。

战略在总体战略的范围内执行。战术和具体行动方法用于小范围活动中为某个具体运动执行战略。

**罢工 (Strike)：** 故意限制或暂停工作，通常是暂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目的而对雇主施加压力，有时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对政府施加压力。

**战术 (Tactic)：** 它是基于这样一种构想的有限行动计划，即在冲突对抗的一个有限阶段如何有效利用可用的行动手段实现具体、有限的目标。战术所要达到的功用，是在整体冲突对抗的某个阶段执行一个更广泛的战略。

**暴力 (Violence)：** 是针对他人实施的、会造成伤害或死亡的外在身体暴力，也包括威胁施加这种暴力、或任何依赖这种行为或威胁的行为

某些类型的宗教或伦理上的非暴力，对暴力的理解要宽泛得多。这里对暴力的定义要窄一些，它给这些宗教或伦理的信仰者留有空间，使他们可以与出于实用主义原因而准备进行非暴力抗争的个人与团体合作。

